

第一章

再平衡中国经济以维持长期增长

Huw Mckay 宋立刚

迎接国内结构调整对持续增长的挑战，在对全球平衡、稳定和治理承担更多责任的同时主张发展的权利并且不纯粹因为规模大而受到惩罚，以及代表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是目前中国要应对的主要问题。无论中国成功或者失败，都将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显著的影响。

——迈克尔·斯宾塞（2011：198）

引 言

对再平衡中国经济增长的呼吁首先源于中国内部的结构问题，同时还源于它同世界其他地区的关系。与中国在 21 世纪头一个十年的国际收支盈余同步发生的是经济增长和发展所面临的不断深化的内部结构性风险。这些结构性挑战包括产生于动态内部转型的增长构成、中国的贸易定位、资源使用轨迹和二氧化碳排放、分配的福利问题以及国际约束。目前，中国被认为有必要面对这些挑战以便在未来将增长路径带入更可持续的轨道（Deer and Song, 2012）。今年的《中国前沿》将考察在国内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在处理经济失衡和维持增长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型必须经历重大的并且经常是快速的

经济结构变迁——广泛的工业化进程、城市化和农业改革（Syrquin, 1988）。转型经济挑战会作为快速结构变迁的结果出现，如果处理不当，将会对未来增长造成风险。快速的结构变迁还可能带来福利挑战，因为收入分配平等所需要的制度设定可能不会出现。如此一来，最好是将对平衡经济增长的追求看作一个宽泛的政策目标，这一政策目标在于限制增长的风险和减少对福利的负面影响。因此，这不应该被表达为一个具体的目标，诸如减少经常账户盈余或者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这一政策的角色在于在设计 and 实施一个框架，这一框架能够在最小化寻租机会的同时减少扭曲，鼓励和奖励创新，均等化获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投资资本的机会。对实现这一环境的要求将会创造对制度改革的需求，从而使结构变迁以破坏性最小的方式进行。

中国巨大的总量失衡——被粗略地概括为国内消费失衡——和反映过度储蓄的外部收支盈余已经广为人知。失衡的国内消费通常是指以支出法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相对于消费而言过高的，以及直到最近一直在增长的投资份额。外部收支失衡通常是指中国的经常账户、贸易账户和私人金融账户盈余。尽管可以被打上“失衡”这一标签的中国经济特征众多——包括汇率水平、城乡收入分割、沿海—内陆分割以及在获取信贷、教育、社会保障和住房机会上的不对等——在某种程度上，它们都与基本的宏观经济结构和外部收支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基本宏观经济结构和外部收支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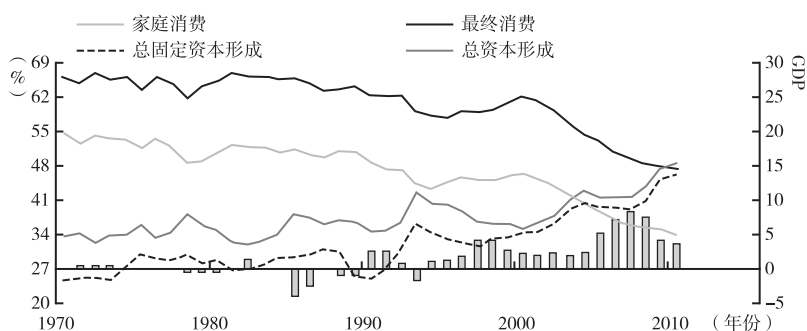


图 1-1 中国：GDP 中的消费份额，1978 ~ 2010 年

资料来源：CEIC 数据，<http://www.ceicdata.com/China.html>。

图 1-1 显示了以 GDP 广义支出法衡量所得到的 1978 ~ 2010 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构成。图中显示了三个明显的大体趋势：从 1990 年代晚期开始 GDP 中的投资份额有急剧的上升，同时最终产品消费和家庭消费份额急剧下降，而净出口在 2002 年以后开始在较小规模的基础上迅速上升。中国 GDP 中高的投资份额意味着非常快速的资本积累率。中国 GDP 中的投资支出所占份额（使用总资本构成衡量——即包括存货）从 2000 年的 35% 迅速增长到了 2010 年的 48%，增长了 13 个百分点。^① GDP 支出中高的投资份额在处于工业化进程的经济体中相当常见，例如 1960 年代的日本和 1970 年代的韩国，特别是在高速（赶超）经济增长的早期（Fukumoto and Muto, 2011; Knight and Wang, 2011; McKay and Song, 2010: 表 1）。在资本缺乏和有大量剩余劳动力的转型经济体中，由快速资本积累所推动的赶超增长可以维持好几十年。中国相对较低的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存量，再加上相对较低的（政策抑制的）城市化率和相对落后的中部和内陆省份，意味着中国大陆的集中式增长可能比包括中国台湾和韩国在内的相邻国家和地区持续更长的时间。

无论如何，由于中国当前所处的对其越来越不利的国际环境，以及其作为世界最大的制造品出口国、产出国和产品消费国所具有的分量，其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正在遭到越来越多的审视。此外，资源密集型增长——通过高污染和高能耗取得的增长——的代价正在加速显现。总支出中较低的家庭消费份额是高边际储蓄倾向和国家水平上的低工资收入份额（和不断下降的真实农村收入）的共同结果。迄今为止，中国已经避免过一次重大的经济减速和衰退，但是特定部门中的周期性过度投资已经成为每一次持续性繁荣的特征，特别是 2004 ~ 2007 年和 2009 ~ 2010 年年间的重工业和刺激性住房供给以及交通基础设施繁荣（McKay, 2011）。

中国 GDP 中的投资支出份额的急剧上升对应着最终消费支出份额的下降。图 1-2 显示最终消费支出的下降是由不断下降的家庭消费份额所导致的。1979 ~ 2010 年年间，总家庭消费支出下降了 13 个百分点。家庭消费支出份额的下降则是由未能被城镇消费增长所抵消的农村家庭消费份额下降所

^① 注意同期总固定资产形成（GFCF）的增长略小于总资产形成（GCF），反映了存货在每一期结束时候的周期性上涨。使用一个跨期更长的样本，对比 2010 年和 1994 年，显示 GCF 增长了 GDP 的 8 个百分点，而 GFCF 增长了 12 个百分点。这反映了不断增长的商业化和企业部门效率减少了作为经济转型初期特征的高存货。

引起的。在这一时期，政府支出份额较低且从 15% 下降到了 13%。^① 结果是，中国的消费支出份额维持在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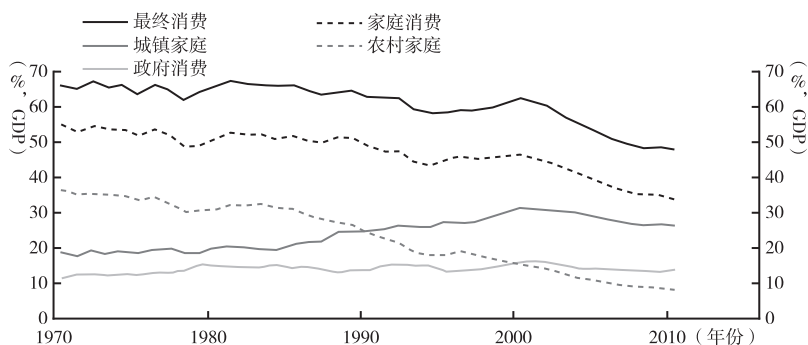


图 1-2 中国 GDP 中的最终消费支出份额，1978 ~ 2010 年

资料来源：CEIC 数据，<http://www.ceicdata.com/China.html>。

如 McKay 和 Song (2010) 所表明和图 1-3 所显示的，2004 ~ 2008 年年间，中国贸易盈余的快速增长是由中国重型机械和交通贸易平衡的极大改善所推动的。机械和交通贸易余额的增加抵消了不断增大的初级产品贸易赤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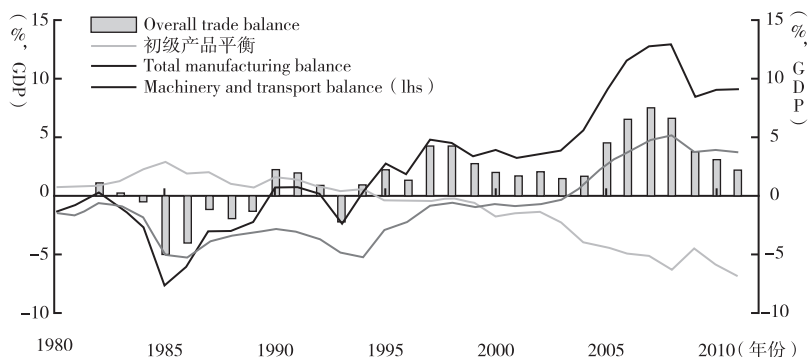


图 1-3 中国的贸易差额，按大部门分解，1993 ~ 2009 年

注释：初级产品包括农产品、燃料和其他矿物资源。

资料来源：CEIC 数据，<http://www.ceicdata.com/China.html>。在 McKay 和 Song (2010) 的基础上更新了数据。

^① 注意政府的收入份额在这一时期是增加的，但是由于公共收入中用于资本形成的部分上升，从而导致了公共消费处于低水平。参见本书由 Ma 等所作章节中对公共储蓄的讨论。

中国的总制造品贸易差额早从 1994 年开始就处于净盈余状态，但是主要集中在低附加值工业品上，并且最初被重型机械和交通部门的净赤字所抵消了；然而，机械和交通设备贸易差额从 2004 年到 2008 年年间转为盈余并且迅速上升。机械和交通设备贸易差额的转变是 2000 年代早期重工业投资增加的结果（Anderson, 2008）。2000 年代早期重工业投资的增加导致了从 2004 年（即产能开始投入使用的那一年）开始的重工业制造品产出的急剧上升，不断扩大的海外市场份额和国内的进口替代。然而产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国内和国外需求并没有匹配性的增长，因此，市场份额的上升造成了不断下降的价格、更低的利润率以及不断恶化的贸易条件（McKay and Song, 2010）。

由中国的结构性失衡所带来的许多挑战是经历快速增长和发展的转型经济体差不多都有的。这是由于从传统到现代经济的经济转型过程都必须经历诸如工业化和城市化等一系列相互关联的结构转型过程。这一经济结构转型通常以集中的工业增长，不断上升的投资份额，急剧上升的生产能源密集度和对资源的需求，以及不断下降的消费支出份额为特征。

然而，就中国经济而言，改革前重工业结构以及制度和政策风格的遗产导致了以不断扩大的失衡为特征的增长模式。这些不断扩大的失衡比在其他工业化进程中所见到的更为明显，且在中国改革初期并未出现。的确，由于家庭收入在传统国有部门以外的劳动密集型生产迅速增长的基础上得到提高，以现有的标准来看中国在 1980 年代的增长模式非常平衡。然而，由于 1990 年代制度改革的止步不前，中国的国内支出和外部失衡在 2000 年代扩大了。这强化了投资拉动的产业结构，特别是在重工业生产和房地产发展方面。当前的增长模式凸显了停滞的结构改革领域的机会成本，这些领域包括迁移和劳动力市场体系、垂直的财政关系、国有企业和金融系统。

应对中国的经济失衡需要进行经济政策改革以引导一个新的增长模式，这要求对当前产业结构和相关的制度安排进行重大调整。关键在于改变经济主体运行的经济环境和激励结构。再平衡政策的目标是通过提高最终支出中消费的相对份额来提升中国经济的内部吸收能力，而不是通过减弱出口的影响；以及通过改善了的市场机制将资源从相对低效的部门转移到经济中更富生产力的部门。

有三组市场增进型的制度改革是必要的：劳动力体系改革、金融体系改

革和政府体系改革，特别是在涉及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部门中。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也表明了这些渠道在改善国际失衡上的重要性（Deer and Song, 2012）。

中国迁移工人的有效的（相对于空间的）城市化是再平衡中国宏观经济最有效的和最现实的短期政策措施。制度性改革可以加速中国移民和城市化的长期进程，这将提升国内需求，从而减少中国宏观经济的内部和外部失衡，并改变当前失衡的产业结构。通过消除进入城市的障碍和确保平等地享有社会住房、教育、健康和社会保障^①来实现农村迁移工人城市化的政策将很可能增加迁移工人的消费（Song et al., 2010）。

并且，该城市化进程要求对城市基础设施（诸如公共交通和公用设施供给）和服务行业进行投资。这一效果，再加上迁移工人更高的国内消费，将会推动增长和结构转变。城市化农村迁移工人还有助于整合中国分割的劳动力市场，为长期真实工资的上涨提供基础。真实工资的上涨可以通过提高国内需求中的家庭消费^②以及为真实汇率升值提供基础来加速结构转变。这还能够推动中国产业结构转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部门将会从收入得到改善的家庭部门所拥有的更广和更深的消费篮子中受益。这将对就业产生积极影响，并使未来增长在质的方面得到改善。

给定再平衡中国产业结构这一目标，要在资本配置，资本成本和国内金融改革同汇率安排的联系这三个相关领域实现再平衡必须对资本市场进行改革。尽管中国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在改革期间显著深化了其资产基础，中国的正规信贷配置体系仍然很窄，主要导向国有部门，因为国有银行（SOBs）继续主导着这一部门。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部门以相对低于私人市场中通行价格的价格水平或者以名义GDP增长率这一宽泛指标作为价格进行资本配置，这强化了过宽的投资结构和支出失衡。

① 本书由 Andrew Watson 所作的一章提倡对退休收入体系进行商业化，这一建议同我们的想法一致。

② 思考这一关系的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工资一利润比。如果工人得到的支付低于他们的生产率，单位劳动力成本就会下降而利润会上升。这正是过去十年间所发生的。改变这一动态关系的方向——支付完全的工资（或者即使是一段时期的向上调整工资）——将会降低利润，提高工资份额，提升消费，同时还可能降低投资，尽管对不同部门影响的差异以及由单位劳动力成本上升所导致的资本和劳动相对价格的变动使得对投资的影响不明确。

很难在不实行汇率制度自由化或开放金融（资本）账户的情况下发展国内金融市场。这两个方面是相互增强的，尽管是周期性的（McKay, 2007）。汇率仍然是中国货币政策的锚，任何向浮动性货币的转变都需要转向一个不同的锚。当前建立银行间借贷市场和进而建立短期基准利率作为锚的努力呈现出了一丝希望。然而，实际来讲，这一市场仍然不成熟，流动性仍然多变，其独立地锚定货币政策的能力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猜测。目前，所有针对金融自由化的处方都应该在现有体制背景下提供。

一个可行的改革是将中国巨大的非正规金融部门纳入官方金融体系，同时移除行政性施加的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和贷款利率下限。改革的目标将会是建立一个合法的小型非银行金融存贷款机构部门。^① 这些企业将会同银行体系展开竞争，为家庭和中小企业（SMEs）提供基于市场的合同条款。一旦这一改革措施有时间形成推动力，就可以开始将目标移向作为银行体系更进一步市场法则化的私人资本流出的自由化。这还能够获得增大银行贷存比的好处，从而增大银行批发融资需求，深化银行间融资市场，增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效果，并从而适应所必需的放弃汇率锚的转型；然而果真如此的话，关于金融改革周期性的观点又将再度登场。在资产价格较低和近年来准财政贷款扩张导致巨额遗留贷款的情况下，金融资产恶化的可能性支持采取更谨慎的方法以避免不必要的波动。无论准确的时间框架为何，如果想要资本配置为实现最终的再平衡目标贡献积极力量，那么深化 SOBs 改革都是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最近的官方评论^②和将利率自由化纳入“十二五”规划的做法为实现这一希望提供了一些基础。

当前地方政府的投资模式，特别是在房地产投资上扮演的角色，以及高的重工业投资份额导致中国经济在每一个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阶段经济都重复性的过热（Mckay, 2011），是引起中国周期性宏观经济失衡的关键因素。1994年财政改革以来，主要的政府收入收归中央，而地方政府仍然承担主要的公共和社会支出责任，特别是在健康和教育上（图1-4）。这种财政和

① 最近中国影子银行的出现表明这一目标并不遥远。通过 CEIC 得到的官方数据显示非银行融资（和银行表外活动）占到了2010年“总社会融资”的44%，这是实质性的。的确，接下来非银行金融的放缓是导致2012年前半年经济活动减速的主要因素。

② 根据亚洲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温家宝总理在2012年4月份的一次广播讲话中提到了SOBs的垄断势力。

政府体系不仅导致了地方政府最大化增长的强劲激励，也导致了通过增加新的投资，例如房地产投资，而非通过提高消费来实现增长的压倒一切的财政激励。在这些投资领域，地方政府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获得收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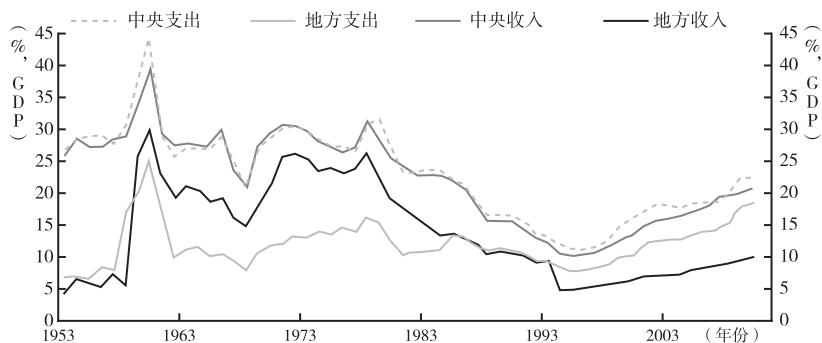


图 1-4 各级政府收入和支出

资料来源：CEIC 数据，<http://www.ceicdata.com/China.html>。

当前地方政府投资——更宽泛的，包括支出——的情形可以通过将更多的支出投向社会住房、教育和社会服务（诸如健康、退休收入、交通、失业保险、公共空间和环境舒适度）来更好地满足中国当前城市人口和迁移人口的需要。在中央和地方财政体系改革上，还有更多需要做的，包括将当前的土地交易税制度转向财产评估制度。减少对住房转手和土地销售的依赖将会消除当前体制下的两项最严重的激励扭曲，同时，转向住房实施定期估价征税将会减弱投资者空置房产（无人租赁的）的意愿，从而实现住房供给的有效增加。将当前严重的顺周期的收入源（土地销售）转向类似的年金流将会实质性地增强地方政府的财政可持续性。最近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债券的举措，尽管打开了地方融资平台，是有助益的政策，但是并没有击中要害。

再平衡中国经济还要求改革国有企业（SOEs）部门。这既有即期的原因也有长期原因。尽管中国的 SOEs 产出不再占到总产出的多数，SOEs 在战略性垄断部门仍然占有主导地位（Xiao et al., 2009）。2000 年以来重工业利润和企业储蓄的上升大部分来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还对旨在走向更均衡增长路径的中国产业结构改革形成了长期挑战。尽管非国有部门产出占到了 2007 年工业产出的大部分，超过 53% 的非农固定资产投资来自

国有企业，而与此同时国有企业只雇佣了 13% 的劳动力（Brandt and Zhu, 2010）。这种投资和劳动雇佣的不相符反映了 SOEs 所在的重工业的资本密集性。然而，它们同时表明了无效率的跨部门资本配置，而这也反映了中国要素市场仍然存在巨大的扭曲，这一扭曲一直在使国有企业部门不成比例地受益（Huang and Wang, 2010）。因此使中国经济转向国内需求需要让非国有企业有更好的机会获得资本，减少它们进入国有企业占主导部门的障碍，将这些相同领域进一步对外商直接投资开放，更进一步地私有化和更多地强调涉及股利支付的股东权利。如果能够通过改善要素市场来允许更多的资源进入充满生气的非国有部门，总的机会成本就能够进一步减小乃至最小化。除非中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否则这一目标无法实现。

在硬基础设施上的投资，从通信到交通运输，仍然是长期增长的中心。但是从水泥和钢铁生产到机械和交通产品生产等特定的重工业领域也存在明显的周期性过度投资倾向。竞争和反托拉斯政策对于更充分地再分配垄断租是必需的（Tyers and Lu, 2008），特别是在中国的战略垄断和支柱产业。开放分享所有权和贸易可以潜在地将储蓄再分配给更广泛的投资者和允许新的商业进入。与此同时，通过统一包括民营企业 and 外资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公司税税率来进行公司税改革可以潜在地将更多的企业储蓄和利润再分配给消费者。这表明，再平衡的任务同样依赖于中国如何改革和加强其监管体系，特别是同竞争、市场进入和税收有关的那些。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结构进程有效地走向成熟，发展早期阶段的高投资率会逐渐转向消费份额的缓慢上升。当映射到人均 GDP 时，一系列发展指标就会呈现出为人们所熟知的倒 U 型（有时被称作库兹涅茨曲线，例如：McKay, 2008）。因此，预期中国的内部吸收能力会随着时间上升是完全合理的；然而，尽管中国内部吸收能力的上升从定义上看能够减少中国的外部盈余，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经常账户会立即转入赤字；事实上，眼下可能仍然存在双顺差。基于以下的原因，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在近些年有所缓和：a) 对出口品需求的疲软；b) 进口品一篮子价格的快速上升；c) 对进口资源的强劲需求。尽管这一下降的一个基本特点是明显的周期性，因此我们不能将最近的一个绝对值水平看作“跳转折点”，但是经常账户重新回到 2007 年的水平几乎是不可能的。Ma 等对经常账户的粗略估计为讨论和辩论提供了好的起点，其估计显示在未来十年平均经常账户水平将会趋向于占到

GDP 的 1%。

无论如何，当前正在形成的压力都将最终说服中国加速其结构调整的步伐。这一结构调整包括与实现完全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同步的资本账户开放。与此同时，中国实现再平衡目标的最终成功还取决于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何克服它们自身的结构问题。美国的经验表明，虽然深层的衰退能够减小外部失衡，通过财政扩张来消除民间需求收缩的消极后果会显著地降低政策弹性。欧洲的经验则表明，老龄化的、缺乏劳动力市场弹性和汇率弹性、资本账户开放的发达经济体发现同其调整失衡的任务相伴而生的还有金融不稳定和不断增加的政治风险。日本的经历是一个警示，它表明有时候即使是投资份额的快速下降也无法带来外部再平衡。在需求中心和相对价格持续变化的情况下，维持一个使资产负债表恢复正常所需要的扩张速度，是全球经济将面临的挑战。

处理中国的经济失衡问题要求必须进行经济政策改革以促进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可持续的增长模式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产业结构和贸易定位。再平衡要求采取策略以清除来自传统国有重工业结构、政府结构和支持它们的宏观金融体系的要素价格扭曲、成本扭曲。

市场增进型的制度改革将会是减小中国宏观经济失衡的中心所在。转型的下一个阶段必须在四个关键领域确立一个改革策略：迁移和劳动力市场体系、政府体制改革（具体到地方政府，应强调一个可持续的财政政策和更好的支出决策）、国有部门占主导地位的非金融部门改革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改革。这些战略性领域中的每一个都构成了路径依赖链条上的一个关键环节。而这一链条构成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结构轨迹。这些部门的改革将会在与实现平等（当代的和跨代际的）、平衡和可持续性相关的一系列次级舞台上产生强大的正向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

本书的结构

我们以这一陈述开篇：“政策的角色应该是设计和实施一个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在最小化寻租机会的同时减少扭曲，鼓励和奖励创新，均等化获得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和投资资本的机会。”本书的每一章都致力于应对再平衡问题。第一部分包括那些在一个广泛的宏观经济框架下直接处理这一问

题的文章。第二部分包括那些从部门或子部门角度出发分析不平衡的章节。

第一部分的开篇一章由 Rod Tyers 完成，本章将再平衡的需要刻画为对内向型增长的探求。为了搭建讨论的框架，Tyers 提出了一个政策体制的选单，这些政策看起来在实现最终目的上是很有希望的。这些政策随后对经由强调大企业寡头垄断权力的中国经济模式进行了检验。

从一个复杂的中等收入陷阱概念出发——“区别存在于收敛过程中的‘自然’减速……和强大的既得利益所导致的过早停滞之间”——Tyers 发现成功的内向型转变需要对寡头垄断租进行更猛烈的攻击。以什么样的方式？Tyers 认为，无论是相对于价格管制还是服务上的外来竞争，纯粹的私有化和产业分割都提供了更少的希望。

Anders C. Johansson 所写的章节提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主张，即金融抑制是导致中国经济内部和外部失衡的根源。他认为全面综合的金融改革应该成为任何试图纠正失衡的协同努力的中心，尽管他可能强调了必须考虑正确的排序。通过在一个完整的框架内讨论中国金融抑制政策的显而易见的国内外症状，Johansson 逐步建立了一个极富说服力的陈述，即众多表面上看来不相干的问题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富有成效地进行考虑。

在第四章中，Guonan Ma, Robert McCauley 和 Lillie Lam 以他们在中国的储蓄率方面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近期成果作为基础。本章着力之处是基于储蓄—投资视角的经常账户盈余，以及浮于表面的汇率。他们首先对该领域的状况进行了回顾，接着对下一个十年储蓄份额和投资份额的未来变动进行了有根据的预测，此外还对采用各种方法所绘制的真实汇率历史变动轨迹做了考察。笔者总结认为随着储蓄份额相对于投资份额的更快下降和相当可观的已经发生的（以及未来的）人民币真实汇率升值（作者认为这将继续发挥作用），经常账户盈余很可能在未来几年减少。

第五章和第六章可以放在一起考虑。在第五章，曲玥、蔡昉和张晓波认为由于沿海不断上涨的成本压力的驱使，“飞雁”正在往内陆转移。在第六章，余森杰和田巍为中国加工贸易的“DNA”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和高度细分的图景。这些“飞雁”中的许多正属于加工贸易。Que 等人从经验上证明了来自沿海的推力何以会产生。他们表明沿海省份所占的制造业活动份额遵循一个倒 U 型，在要素价格上涨到一个临界值水平之前，集聚的好处在一开始会不断吸收来自内地的资本。该临界值水平是开始向西部转移的信

号。通过充分挖掘通过创造性地合并交易和企业层面贸易信息所得到的巨大的数据库，余和田对加工贸易做了极为详尽的描述，包括主体、对象、地点以及方式。作为对该章节描述性部分的补充，他们估计了加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并总结认为加工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低于从事普通贸易的企业。

第一部分最后一章由王碧珺所写。王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DI）是否能够通过改善增长质量对再平衡问题做出积极贡献。她认为在没有更多有关 ODI 动机和特征的详尽知识的情况下，这一问题是无法回答的。为了获得这一洞见，王展示了关于已获得批准的交易的数据。这些数据经过了适当的清理，以适于研究再平衡问题。在王看来，如果进行 ODI 是源于资源保障的视角，正如它目前所做的那样，它便消除了经济体的一个瓶颈。但是这也可能降低以更根本的方式改变增长模式的激励。如果进行 ODI 是出于获取战略性资产，就更有希望实现再平衡。这种情况下，ODI 将同时产生直接的和内在的影响以改善增长的质量。在日本的发展历程中对结构变迁发挥了强有力作用的效率寻求型 ODI 尚未被看做驱动中国企业 ODI 的主要因素。

第一部分最后两章反映了本书诸多特点中的一个：即认识到分类数据——无论是来自企业、省、县或者是单个行业——在理解中国的宏观经济趋势上面具有巨大的价值并且不应该成为部门专家们的唯一领域。第二部分各章节一脉相承，提供了一些极富吸引力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不平等的空间特征、迁移决策、农村人口和代际流动。这些数据中的一些来自官方；还有一些则来自艰苦的调查工作。

近来，收入不平等已经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焦点。本书从诸多角度为有关这一问题的争论做出了贡献。第一部分研究在宽泛的宏观经济框架下触及了不平等问题，在此基础上，Tsun Se Cheong 和 Yanrui Wu 所作第八章中的详细结果极大地增进了我们有关中国收入不平等空间方面的知识——都到县级水平。进一步地，在第十章，Jane Golley 和 Sherry Tao Kong 对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乡城迁移（RUMiCI）调查数据库进行了深入探究，拓展了我们对跨代际和地区教育机会（引起不平等的一个根本性因素）的理解。

Cheong 和 Wu 对收入不平等的空间分布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们的工作非常与众不同，因为从县级水平开始，他们在五个不同的空间层次上估计了

导致不平等的原因。他们发现省内人均产出的差异——即同一省内各县之间收入水平的差异——是总体不平等水平的重要来源。他们认为这使得政策制定具有了很强的地方性成分。进一步地，他们发现在内陆地区（县际不平等占主导地位）、沿海地区和东北地区（地市间不平等是另一个主要因素），不平等具有不同的空间特征。

Golley 和 Kong 对三部分人群：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乡城迁移人口教育程度的代际特征进行了详细研究。他们从一个多层次问题开始：“跨代际教育程度的持续反映了遗传因素，非均等的机会抑或是非均等的回报？”他们通过给出有关以上三部分人群教育程度的代际持续/流动性的证据来处理这一问题。他们发现，城镇和农村地区教育回报的非均等特征，从儿童早期开始的农村教育投入的匮乏，以及分割的城镇劳动力市场扭曲了寻求教育，特别是初中以上教育的激励；城镇居民有更强的向上移动的激励，农村居民的激励较少，乡城移民则介于两者之间。这强化和扩大了城乡分割。

第九章和第十一章在农村社区，以及它们当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内部移民方面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在第九章，Sylvie Demurger 为进入移民决策（是否离家，去哪里（去多远）和去多久）的复杂的经济和社会演算提供了一些引人注目的见解。她的分析框架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劳动力迁移的新经济学”。该分析框架以家庭为基本的决策单位，而家庭以最小化收入风险为目标。该章研究的边界超出了经济的、土地的和地理的因素以纳入社会和家庭网络的影响。研究显示社会网络对远距离迁移的移民决策有显著的影响，而只有家庭网络对较短途的迁移有显著影响。第十一章对 2010~2011 年冬季在中国农村一些重点人口迁出地区所开展的一个新的人口调查进行了初步的描述。钟甫宁和向晶对他们的样本和官方家庭调查进行了对比讨论，详细介绍了他们所采用的方法论和搜集方法，对于数据的基本轮廓给出了初步的总结。期望随着时间推进可以从这个项目获得更多的信息。

任何人都无法在不提及社会保障网络的情况下对中国的失衡进行良好的讨论。然而，针对这一重大政策领域所做的详细工作出人意料地少。Andrew Watson 所写的第十二章主要关注老龄社会中退休收入的提供，他的研究填补了该领域研究存在的缺口。Watson 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前的体系是充满矛盾的，一个地理上流动的劳动力市场不安地伴随着一个地理上僵化的社会保障系统。在对社会保障的历史发展和当前政策进行了权威性描述之

后，Watson 建议采用一个以为所有公民提供均等机会为特征的、一体化的、便携的、由中央筹资和管理的体系。这一章强烈推荐给那些在某个阶段发现自己含糊其辞地建议在中国进行社会保障改革，却没有准确意识到哪些措施是必要的那些人。

接下来的一章，由赵志耘和杨朝峰所写，审视了中国在产业链升级和成为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者方面所做的努力。这些努力是中国在一个积极的道路上走向更平衡的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一开始，作者指出中国当前高技术产业正在经受弱创新力、低技术密集度和低经济效益的折磨。他们断言，在发达国家寻求“技术封锁”战略的情况下，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建立本土创新能力，由进口技术扮演补充性的角色。在他们看来，这意味着应该推出企业偏好的具有创新性潜力的产业政策。他们还还为政策设计提供了一个可操作性建议。这一建议将会很快被那些信奉“得到衡量的得到执行”这一准则的人所认可。他们认为在区域水平上高技术产出的定量目标应该被强调寻求更复杂生产的定性化的目标所取代。更进一步地，他们认为应该采用竞争政策以消除进入壁垒（并附注到中国的大型企业比小企业更缺乏创新性），政府应当扮演一个引导性的角色，而市场力量应该起到催化作用，同时应当注意到创新想法商业化的内在制度性弱点。

本书由论述中国资源禀赋的两章作为总结。第十五章论述了中国对能源供给保障的追求，第十四章则着眼于中国为维持水源供给质量和丰富性所做的努力。在第十四章，杨红、张卓颖和石敏俊适时地提醒到，水污染和水资源匮乏问题都将危害到经济增长。他们强调，中国的产业结构——使得中国成为一个虚拟水（或间接耗水）的净出口者——与其作为水资源穷国的身份是不相容的。他们还在国家以下的层面进行了分析，强调经济活动的区域分布使得水密集度高的制造业布局在了水资源贫乏的地区。

能源安全仍然是一个在中国内外容易引起情绪激动的问题。张忠祥所作的本书最后一章，旨在处理那些在他看来围绕着中国和国际能源安全问题的“错觉和误解”。巧合的是，夏威夷东西方中心，也是张的学术家庭之一，看起来是一个用于调解有时候看来是刺耳的谈论的理想之地。张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首先，对于中国而言，能源安全实际上是石油安全。其次，马六甲海峡是中国战略性弱点中最主要的一环，给定中国在该区域弱小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和使用这一狭窄水域的不成比例的进口量。他将这一现实同中国

的一种感觉，即西方世界对中国的“石油封锁”是一个真实的威胁，联系到了一起；接下来他通过对这一论点进行系统分解来化解对立。最后，他强调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国外相关石油方和中国国内石油公司之间的石油换贷款交易在减少能源风险方面并不成功。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石油企业在将石油带回国内供国内消费方面并未显示出清晰偏好。在国内市场，石油价格被设定在低于国际市场通行价格的水平上。进一步地，他认为在净效应意义上，中国的投资是在增加全球潜在供给，这有益于所有的石油消费者。

参考文献

Anderson, J. , 2008, ‘China’s industrial investment boom and the renminbi’, in M. Goldstein and N. Lardy (eds), *Deba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 Policy*,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pp. 61 – 69.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2012, ‘Chinese premier blasts banks’,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4 April, viewed 15 May,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4750404577321762422668428.html>.

Brandt, L. and Zhu, X. , 2010, *Accounting for China’s growth*, IZA Discussion Paper No. 4764,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Labour, Bonn.

Deer, L. and Song, L. , 2012, ‘China’s approach to rebalancing: a conceptual and policy framework’,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vol. 20, no. 1, pp. 1 – 26.

Fukumoto, T. and Muto, I. , 2011, *Rebalancing China’s economic growth: some insights from Japan’s experience*, Bank of Japan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1 No. E – 5, Bank of Japan, Tokyo.

Huang, Y. and Wang, B. , 2010, ‘Cost distortions and structural imbalances in China’,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8, no. 4, pp. 1 – 17.

Knight, J. and Wang, W. , 2011, *China’s macroeconomic imbalances: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Bank of Finland Institute for Economies in Transition Discussion Papers No. 15, Bank of Finland, Helsinki.

McKay, H. , 2007, ‘Reforming China’s exchange arrangement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overeignty, sequencing and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n R. Garnaut and L. Song (eds), *China: Linking markets for growth*, Asia Pacific Press, Canberra, pp. 290 – 315.

McKay, H. , 2008, *Metal intensity in comparativ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hina, North Asia, the United States & Kuznets curve*, Global Dynamic Systems Centre Working Paper 006,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McKay, H. , 2011, ‘China’s turbulent half-decade’, in L. Song and J. Golley (eds), *Rising China: Global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ANU E Press, Canberra, pp. 9 – 27.

McKay, H. and Song, L. , 2010, ‘China as a global manufacturing powerhouse: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nd structural adjustment', *China & World Economy*, vol. 18, no. 1, pp. 1 – 32.

Song, L. , Wu, J. and Zhang, Y. , 2010, 'Urbanis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xpansion of domestic demand',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vol. 31, no. 3, pp. 194 – 216.

Spence, M. , 2011, *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Press, Perth.

Syrquin, M. , 1988, 'Patterns of structural change', in H. Chenery and T. N. Srinivasan (eds),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North-Holland, Amsterdam, pp. 203 – 273.

Tyers, R. and Lu, F. , 2008, 'Competition policy, corporate saving and China's current account surplus',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and Econometrics No. 496, College of Business and Economics,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July.

Xiao, G. , Yang, X. and Janus, A. , 2009, 'State-owned enterprises in China: reform dynamics and impacts', in R. Garnaut, L. Song and W. T. Woo (eds), *China's New Place in a World in Crisis: Economic, geopolitical and environmental dimensions*, ANU E Press,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anberra, pp. 155 – 178.

(张川川 译)